

总主编 路甬祥
执行总主编 牛文元

第13卷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

The Overview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农业与 可持续发展

主 编 程 序

- 追溯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潮的演进过程
- 比较中外可持续农业观念和环境的异同
- 理清研究可持续农业的学科脉络
- 探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 直面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 探索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总主编 路甬祥
执行总主编 牛文元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

The Overview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第13卷

中国农业与 可持续发展

主 编 程 序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13卷。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及“循环经济”的重大国策和原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本书从古今中外可持续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入手,系统阐述了我国由常规现代化农业向可持续农业转型所必需的各种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和对推进方式的探索;可持续农业的支撑理论与学科,体(机)制创新和法律(规)、政策调整;最后,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各主要生态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方略。强调中国经济底子薄、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量很少以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国情,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可持续农业的模式,并探讨了农业发展“多赢”的独特途径和方式。内容力图体现中国特色。

本书可为各级决策者、规划者、管理者以及从事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各类国际组织、有关科研院所、企业的研究者和高等院校师生提供参考。同时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大型文献集成之一,将成为国内外图书典藏的理想选择。

审图号:GS(2007)1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程序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13/路甬祥总主编,牛文元执行总主编)
ISBN 978-7-03-017524-3

I. 中… II. 程… III.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 IV. 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0611号

责任编辑:李敏 沈红芬 张启男/责任校对:钟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整体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A4(880×1230)

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 1/2 插页:1

印数:1—4 000 字数:662 000

定价:9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编委会

总 主 编 路甬祥

执行总主编 牛文元

总 策 划 曹效业

顾 问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述彭 邓 楠 刘东生 潘教峰

曲格平 沈国舫 石元春 孙鸿烈

叶文虎 张坤民 周光召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蔡 昉 蔡运龙 曹效业 陈 勇

陈宗兴 成升魁 程 序 樊 平

方 新 傅伯杰 甘师俊 葛全胜

黄良民 黄宁生 江泽慧 康 宁

李 周 李成勋 林 鹏 刘 毅

陆学艺 路甬祥 马 中 穆荣平

牛文元 欧阳志云 齐 晔 史培军

孙 楨 万本太 汪继祥 王 浩

王 毅 王昂生 王玉民 魏一鸣

吴荣庆 向安全 薛 澜 杨开忠

叶裕民 张 力 张文驹 张象枢

赵景柱 朱 坦 诸大建

《中国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编委会

主 编 程 序

副主编 邱化蛟 朱万斌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常 欣 程 序 李玉英 邱化蛟

唐 衡 吴玉红 徐秀丽 杨新国

杨直民 俞 海 张毅功 朱万斌

总序

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革新生产力，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物质基础上，必然又将紧密地联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形态和内容。与此同时，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会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积极进步。

中国在未来 50 年的时间内，将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达到经济更加稳健、社会更加公平、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精神更加富足，全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这就必然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战略对“发展理论”的创新，对“发展思路”的深化，对“发展实践”的提升。

依照大部分学者的归纳，在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以下六项基本压力的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带来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超常规利用所带来的压力；加速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持和提高所带来的压力；全面实现城市化战略目标所带来的压力；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并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所带来的压力；不断提升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水平所带来的压力。上述六项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压力，只有在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化解和克服。

中国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适；同时，必须把人的生存与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这一主线的实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既要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理性的觉醒，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政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关系）的协调、和谐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认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核心。

“发展”这一术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其内涵已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丰富的新层次。《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发展”一词的释义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语，但是一般说来，发展被用来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改善。”可以看出，所谓“发展”，其内涵更加强调动态上的量与质的双重变化。

到了1987年，在布伦特莱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又对“发展”作了如下的描述：“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变革。”在这里，“发展”已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以人的理性需求为中心以及联系到社会领域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戴尔和库伯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中进一步建议：“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这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均衡，被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最高原则。

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之上，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定义：“‘发展’是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对行为轨迹的正向识别。‘发展’将导致上述复杂系统朝向更加合理、更为协调的方向进化。”在此强调了“发展”的不可逆性、进步性、正向性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

在西纳索为法国著名学者佩鲁的《新发展观》所写的序言中，引入了孔德在19世纪所总结的名言：“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确定人类究竟如何实现真正的完美，有着难以估量的优势……”这里，孔德显然把发展与文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感触，他们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预示着传统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方法，将发生某种深刻的变革。其中必须强调指出，只要一谈到“发展”，就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的初步诉求。由此出发，其合理的顺延就逐渐导致了“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源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正是对上述“发展”概念的采撷、萃取、深化和拓广。

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整体进化在特定时段的本源冲动，它与不断满足人的理性需求、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培育人的能力、不断实现人的理想，在本质上是一个事物在不同侧面的不同体现。由此出发，在人类整体进化的长河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与积淀，国家富强与人民福祉的提高与巩固，先进文化与思想价值的发扬与延续，政治制度与人文规则的演进与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本质与外在特征的综合反映。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在生产水平上的差异程度相对而言不是很大，表现在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生产能力基本上互相接近；人均的物质投入与能量投入在数量上与规模上基本处于相近等级；生产产品的多样性与社会

分工的程度均不太发达；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与对资源的攫取程度在本质上都未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因此，这个时代对于发展的提法和要求，其认识深度与迫切程度尚不十分明显。

进入18世纪，人类开始迎接工业文明时代，尤其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末，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在生产水平上的差异程度，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形成了巨大鸿沟，表现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落差，加上人在需求上被满足的欲望所形成的巨大惯性，显著地拉大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此在全球尺度上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乃至心理背景尽管仍存在着较大差异，但由于经济的互补、文化的融合、信息的交流和“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上所产生的共鸣和在可持续发展行动上所产生的共振，却呈现出了不可遏止的加速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到了现代，可持续发展越是受到各国重视的原因。

到了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网络化、社会知识化和普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体验的四大基本现实。它们既主导着资源、生态、环境的演化方向，同时也主导着经济、社会和人文基础的创新变革。无论是对生态、环境退化的忧虑，还是对人文基础创新的憧憬，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解脱和体现。

由上述观念引发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应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应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应从全方位总结“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深层次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融入到时代演化的趋势之中。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所规定的内容，不同的国家或区域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设计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行动，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努力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本质，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通常亦称之为“数量维”）。发展度强调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是否在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在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改善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其二，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通常亦称之为“质量维”）。协调度强调效率转化和要素整合的能力，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也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动力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其三，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通常亦称之为“时间维”），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持续合理性，以及能

否维持代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持续度更加注重从可持续意义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总括而言,识别可持续发展系统所提炼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度)、质量维(协调度)、时间维(持续度),并力图实现“三维交集”的最大化,表达了科学度量可持续发展的完满追求。

进一步引申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有机统一的基本共识与宏观认知:

其一,发展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对于国家或区域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体协调水平与优化配置能力。

其二,发展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自然进化”、“生态平衡”、“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理性供需曲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供需)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区域发展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对物质支配水平、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建设水平的综合度量。

其三,发展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水平,对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及提供机会平等的的能力,构成了国家或区域判断发展“公平”的表征。其中体现了共建共享的人际公平、资源分配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的总和。

只有上述三大宏观认知同时包容在可持续发展的不同进程之中,任何区域的“发展状态”才具有统一可比的基础,各个区域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测的和可测度的共同内容。

如何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有效性,通常可以归纳成以下七大主题:

第一,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健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它既反对限制财富积累的“零增长”,也反对不顾一切条件的过分增长。所谓健康地增长,一般是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扩大的方式和经济规模增长的度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索洛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人口、资源、环境各个参数的共同约束下,人均财富可以实现非负增长的总目标。”

第二,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它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持续地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应越来越低;对生态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和非物质化增长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可能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拉动整个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第三，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人的基本权利始终被保障和人的基本需求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质是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或区域的生存与发展支持系统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提供和调配达到收入、消费、储蓄等结构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和谐共处与身心健康。

第四，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来源。科学发展观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是依赖于对资源的维持、对资源的深度发现、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对废弃物的资源化。

第五，关注科技创新对发展“瓶颈”的突破。科学发展观始终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充分协调，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能够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进步，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总体要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时曾表达了他的严肃思考：“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来源，但是它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而广泛的应用，必须作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创造力。”

第六，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学发展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七，始终维持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效率是积聚社会财富的引擎，在最大限度调动智慧、创造、组织、管理等要素中，萃取了规模、等级、分工的有序协调，获取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的结果，成为社会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要素。与此同时，社会环境的和谐、社会公平的体现、社会正义的诉求，又必须符合人类文明的整体原则和道德标准。因此，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其根本目的在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长河中不断自我觉醒的连续进程，具有正向矢量演化的动态特征。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前进中逐步提升的，也就是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和要求是与时俱进的。综观人类历史整个情景断面的连续演进，以及对

世界发展总体进程的本质抽象，可持续发展实际就是在统一基础上对深层次发展元素的认识升华，同时也是在寻求人文轨迹中的理性积淀。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和放大能力”。从古代到现代，人的活动半径扩大（空间放大能力）与行动速度增加（时间压缩能力），有着连续的和显著的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代表着人类在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能力上，总是随着对时空压缩和放大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理性支配能力”。人不仅要具有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获取能力，还必须具有不断提高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能力和管理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事实上表现了这种理性支配能力的不断增强。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提升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应当把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性进步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动力。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能力”。无论是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还是进入新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优化配置将会在不同组合、不同水平、不同广度和不同深度上实施结构性优化与功能性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以合理地归纳为此类生产力要素在层次上和阶段上的优化能力。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社会公平的实现能力”。毋庸置疑，社会公平程度及缩小贫富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是社会中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区际关系中的最高准则，是保障社会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必然体现出以公理完善、道德完善、制度完善、法律完善去支持社会公平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能力”。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能只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积聚和扩大，它同时还应当满足对精神追求和文明进步的整体响应。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创造能力与精神财富富集程度的和谐统一。

在统一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提高制度的整合能力和规范社会的有序能力”。在高尚的哲学理念和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制度的、法律的、道德的不断完善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民主方式与人文关怀的适宜性选择，是构成可持续发展人文环境的基本主题，也是提高可持续发展组织程度与认同能力的保证。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学科体系、社会体系和战略体系，不可能期待在短暂的时间内立即获得圆满的答案。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只能是在当代知识水平上，发挥众多学者的才能和智慧，编织出近20年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上所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进一步作出更为深刻的研究和更加完整的总结，尚待在未来有更多的创见和积累。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是一部面向国家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学术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大型文献工程，它由国家卷（共 20 卷）和区域卷（共 31 卷）（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组成，是自 1983 年以来特别是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系列研究论述，也是向国内外阐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学术成果。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策划过程中，得到了周光召教授、蒋正华教授、罗豪才教授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吸取了许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意见和建议，邀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学术团体的专家对方案进行研讨和修订，依照“整体规划、顶层设计、严格标准、分卷协调”的原则，力图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水平和质量。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整体编纂与成书过程中，牛文元教授作为全书的执行总主编，在各卷主编的共同襄助下，有计划、按进度完成了这部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文献性和应用性的大型学术论丛。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战略性，表现在这项计划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实施原则、能力建设、区域表达等，并在国家层面上提出可操作的总体描述。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前瞻性，表现在这项计划针对国际国内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要素构成、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整体把握、可持续能力建设的长远规划等，作出了有效的预测。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文献性，是指这项计划在权威学术团体和著名学者的直接参与下，吸取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空表达，为决策者提供有指导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在中国同时也在世界上实现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归纳。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的应用性，表现在这项计划在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成功经验的全面借鉴下，将中国不同类型区域的模式选择、制度建设、实施内容、管理体制，以定量的数值统计和规范的指标体系，动态地予以监测、调控和预报，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使得《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达到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全貌的深刻认识。

中国科学院历来重视科学与社会的互相作用和密切联系，重视和支持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互补功能，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发展战略，提出有价值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多年来，中国科学院不断组织精干力量，与各方学者紧密合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献计献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咨询。《中国可持续

发展总纲》的编纂和出版就是此类努力中的一部分。我相信，通过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一定会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探讨，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百余位学者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即将出版问世。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坚持下去，系统地、持续地认识和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关系。尽管《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坚信在各位专家的关注和努力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建设和能力建设终将其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赢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同和积极评价。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不断进步，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既然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过辉煌的篇章，也一定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出同样辉煌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



2006年9月

前 言

“生存”（指养活十几亿人）、“发展”和“护土”（广义的土，泛指资源与环境）是中国农业在新世纪的三大命题。对于三者各自的内容，已有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全面、系统地论述三者的关系，即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瓶颈”与制约、实施的原则与途径等，则为鲜见。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集约化而凸现和激化起来的。那么有没有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呢？回答是肯定的。

历史上有过若干不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教训，“两河文明”的覆灭就是一个典型。据考证，在现今到处是沙荒地的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平原，最早时曾覆盖着肥沃的林地和草地。从公元前 4300 年起，人们开始开垦种田。当时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下游沼泽地即今巴士拉一带从事农耕，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出现国家和城市；公元前 2000 年建立古巴比伦王国（the Babylonian Empire）。在这 2000 多年里，大片森林被砍伐，草地被开垦；同时发明了技术，引两河的水种植小麦（世界栽培小麦起源地）。由于技术进步和灌溉使小麦单产不断提高，促成了依赖于剩余粮食而发展的城市的形成和增加。然而，到了公元前 2800 年左右，这里降水量开始减少，然后是干旱化出现、水土流失加重。土壤的养分大量丧失，灌渠逐渐被淤塞、湮没。但人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危险性，继续大量进行灌溉。灌溉水中所含的盐分随水分蒸发在土壤耕作层中不断积累，土壤次生盐渍化。因耐盐性差而越来越难以继续种植小麦，不得不改种较耐盐的大麦。再往后，因土壤含盐量进一步增高，大麦单产也下降。这使得依赖于剩余粮食而生存的城市居民的食物来源最终濒于断绝，随着定居在城市的人口剧增和公元前 247 年罗马帝国的入侵，“两河文明”终于烟飞灰灭（Daniel D. Chiras. 1994. *Environmental Science, Ac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4th. The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人类生产方式的集约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加速增长，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凸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及随后农业采取工业化生产方式后，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关系。同时，由于盲目追求经济的不断高速增长，又与人口剧增、资源消耗和造成污染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关系。从系统科学的原理出发，一个只有正反馈机制而没有负反馈机制的系统必然要崩溃，即是不可

持续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在发达国家连续发生的环境污染重大事件,以及70年代发生的全球“四大危机”(石油、粮食、人口、环境),启发了西方有远见卓识之士,开始了对经济增长方式指导思想的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思。《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就是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和食物的生产及其资源与环境效应,在《增长的极限》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四大危机中,粮食同农业有直接的关系;人口、能源和环境同农业也有紧密的间接关系。例如,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大体完成了常规农业现代化(*conventional modernization*)进程,农产品数量大幅度地增加,因此,导致了人口在同期的高速增长。常规现代化农业是大量消耗商品能源及其他资源的产业。1970年与1950年相比,全球(主要是发达国家)农业商品能源消耗量,由2.76亿桶石油当量剧增至9.70亿桶石油当量(Brown, 1988)。而农业既是工业污染的受害者,同时,常规现代化农业又是主要的非点源污染的源头。

《寂静的春天》直接针对农业使用某些化学农药所造成的恶果,提出了对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模式的质疑。可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命题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国际农业的可持续性新思维,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引发、演进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它对整个国际可持续发展思潮的推进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遗憾的是,上述导致经济(包括农业)不可可持续发展的这两个根源(高投入、高产出)对我国农业而言也是致命性的。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闭关自守、人口增长过快,20世纪近半个世纪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决策失误,例如,国民经济成分的战略地位是“重、轻、农”;“以粮为纲”;批“唯生产力论”;“两个不按”——农业不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改革开放后,一时积重难返,由于急于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因而过于看重增长的数量而严重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尤其是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无序状态:如有些人为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或致富而不惜以牺牲生态与环境为代价,野蛮地“开发”资源、污染环境,从而导致市场经济无能为力的弊端开始暴露。这些短视行为必然带给人类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而对农产品需求的剧增,致使人均农业资源的数量十分有限且还在不断减少。为了确保食物安全,在我国粮食和畜禽主产区必须不断地提高农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而国际学术界公认,高度的农业集约化与资源和环境的维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形势特别严峻,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难度较大。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近年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虽然一直在缩小(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2004年已降到15.2%),但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8.2%(2004年数)。农业继续承担着养活十几亿人口和向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等重任。而且,农业也仍然是若干重要资源(如水资源、林地和湿地)的第一大“用户”和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源头。因此,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否,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特别重大。

2)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常规现代化农业,除了为他们自己引以为豪之外,也一直被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专家学者们奉为楷模。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农业在财政补贴、农村社区、水体质量、农药残毒及水土保持等方面陆续出现不可持续的苗头,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极个别的农业思想改革先驱(如英国的A. Howard和美国的J. I. Rodale)就提出的一些主张,如“有机农作”(organic farming)、“生物-动力农作”(biodynamic methods of agriculture)等,适逢现在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1982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Pomona学院召开了主题为“在变动的世界秩序下农业的可持续性”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业可持续性”(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和“替代农业系统”(alternative agricultural system)等概念。这里所谓的替代,就是指找到可持续的农作方式,摒弃正在采用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常规模式。这次会议是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运动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才开始引入中国。当时在发达国家,农业可持续尚处在以理论探讨为主要阶段的后期。这种与常规农业发展思路截然不同的主张,引起了中国农业界特别是农业经济界、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界学者的注意,开展了初步的理论探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峰会后,更有了零星的试点实践。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业工作者对农业发展的思维定式(paradigm)的探索比此次会议时间要早得多。几乎是与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潮同时产生的,即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彼此平行不悖,也没有什么学术交流。所不同的是,在中国是叫做“中国生态农业”而不是可持续农业。其起因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兴起过关于反思建国30年以来农业未按两个规律(即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办事的深刻教训,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两次大讨论。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逐渐意识到,以中国的国情(资源、财力等)不可能照抄发达国家常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不仅如此,还应发扬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强调以生态学规律指导的“生态农业”(叶谦吉等,1978);继而由一些经济学家倡导发展生态经济,生态农业又增加了生态经济学的内容(许涤新,1983)。比较中外两者的出发点、目标及指导学科——生态学和生态经济等,可以看到确有很多相似和不谋而合之处。而这种探索却是中国农业工作者在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条件下独立进行的。可见,中国的农业工作者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超前探索,更凸显其难能可贵。

还应指出,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运动从思维定式的转变到被多数农民接受,在客观条件(如农产品普遍供过于求)非常有利于农业经营方式的转折(transition),以及农民文化科学素质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尚且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并且还不能说可持续农业现已成为农作方式的主流;而中国的生态农业面临诸多不利的因素,却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取得在规模上优于发达国家可持续农业的进展。其中的缘由,特别是我国可持续农业方面独特的推进方式——从农户直至地区级不同尺度的生态农业示范(试)点计划,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发扬光大。

对比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可持续农业还发现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经济和生活水平远远滞后,农业始终还是农民的主业。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离开农村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农村问题不占重要位置。如在美国,只不过强调一下在农场不断兼并情况下的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已。

总之,如果把对中国生态农业的探索也包括在内,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我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也已有相当的积累,基本具备了成书的条件。

3) 在第一篇“历史、现状和继承创新”中,首先介绍了闻名于世的、持续了3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农业。分析其符合现代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质朴哲理,及其对当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作为对比,我国农业在过去的50年中虽然发展迅速,但却难以持续的格局被详尽地加以剖析。“中国生态农业”就是有识之士意识到这种状况后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接下来的章节,则比较了中国生态农业与国外可持续农业的异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生态农业在内的中国可持续农业同发达国家可持续农业的一个极显著的不同,是后者主要通过降低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投入(low-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以牺牲一部分生产力为代价,来争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要采取的只能是积极的措施。任何降低生产力水平和减少农民效益的做法都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

4) 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和推进方式,是促使可持续农业从理念走向现实的三大要素。在篇幅最大的第二篇“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创新”中,土地、农用水、能源和生物物种资源等农业资源的保育和高效利用是主题。特别是我国人均资源量相对于客观需要的资源承载力而言,严重不足,而且目前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也很低。例如,某些所谓的污染物——导致富营养化的物质之所以产生,其实是因为动、植物养分资源施用过量或未得到充分利用,加上排放未受控制才形成的;而所谓废弃物也往往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正因为如此,现代条件下的物质循环、能量多层利用——农业循环经济至关重要。生物资源是一切传统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但在常规现代化和集约化农作条件下,因为追求整齐度、高产以及规模效益,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威胁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又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趋势,不论是土地或劳动力的集约化利用程度,还是物质投入或智力投入的集约化程度,都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农业集约化与生态及环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就是要从技术上突破两者关系的因果性,寻找“双赢”甚至“多赢”的途径。这一点对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这类突破的难度极大,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例如,目前常规现代化和集约化农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单一种(作物或畜禽的品种)、养殖(殖)和连作,结果是完全割裂自然农业系统中各个组分的关系,甚至牺牲掉系统组分的相互作用以及引起的复杂性及新生特性,从而引发很多生产问题。例如,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农药来对付日益猖獗、防不胜防的病虫害。因此,通过重新构建和运用农、林、牧复合系统和农林复合系统(agroforestry system),包